

场,目前难有结论。但这一变局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则是必须面对的新现象。换言之,必须加大从内政角度观察和应对中美关系的力度,必须走出华盛顿和华尔街,跳出好莱坞和硅谷,从美国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州县角度去深化和细化中美关系的研究。这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者来说是一项新的任务和考验。大格局是国际秩序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利益取向、战略态势、关系格局几乎同时生变,涓涓细流正汇成浩浩江河,预示着某种大变局即将扑面而来。美俄、美欧关系的变局,朝核、伊核

问题的变局,几乎与中美关系的变局同步,显示中美关系同全球变局是同步共振的。因此也就决定了,必须跳出中美关系看中美关系,从中美俄、中美欧、中美印、中美日等三角关系的纵横捭阖中,从“金砖”“上合”“G7”等多边机制的分化组合中,综合系统全面地把握。一句话,进入新阶段的中美关系,更需要我们走进去(即加大对内政的研究)和走出来(即加强对国际变局的研究),才会增强我们的底气和信心。○

中国的周边战略与对美关系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邀教授)

2016 年 9 月杭州 G20 峰会后,特别是 2017 年以来,中国以全面的面貌,在东亚及西太平洋这一广大区域内展现了新的温和化态势,有效而显著地改善了周边关系,造就了十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最大成绩。

首先,与过去相比,中国对步步升级的朝鲜核导弹研发采取了空前严厉的态度,在短时间内施加了大规模制裁,这是以前从未做过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争取良性的中美关系。不仅如此,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显著温和化,也更积极地改善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特别是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加大加快了与东盟协商《南海行为准则》的努力,以稳定海上局势和增进中国外交影响。

大致同时,中日关系出现显著改善迹象,在日本政府改变先前有关立场、做出肯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明确表示后,习近平主席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指出中日双方应当在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改善两国关系。不足两周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日本会面,提出当前中日关系既面临新的机遇,亦存在突出挑战,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应言而有信,按规矩办事,在南海问题上则应谨言慎行。此后至今,中日关系的改

善虽有风波,但大致只是小风波,总的进程是稳步向前。可以认为,只要日本政府如此行事,只要中日两国各自大致保持在已经确定的轨道内,两国间多年未有的正式的最高级互访和会晤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实现。

令人相当鼓舞的是,中共十九大前后,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的温和化不仅在继续,而且得到加强。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从 2017 年 9 月起迅速改善。中新关系回暖的原因是新加坡收敛甚或取消了与台湾的军训合作,同时南海形势的显著缓解使之不需很明显地在南海争端中站在美国一边。2017 年 8 月底,中国与印度经过复杂的谈判,几乎突然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洞朗地区各自后撤部队,从而结束(或更精确地说是暂停)了持续两个多月的严重军事对峙。2017 年 10 月 30 日,中韩关系持续严重紧张的局面开始改观,中国政府在中共十九大闭幕后不久,将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与中韩关系的广大而多样的其余方面“脱钩”,或者说实际上放弃了一项大约施行了一年半但无直接效果的政策。中国是一个被普遍认作行将浮现的超级强国,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或曰疏离世界)倾向而出现的历史性机遇时期,愿意对一个较小国家做出一项重要让步,这本身就令人

“心头一亮”。到 2018 年 3 月底金正恩访问北京，中朝关系骤然大幅度升温，中国周边关系的改善已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臻至全面。

形势从不完美，探求永无止境。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困难压倒性地表现在朝鲜问题和中美贸易对抗上。在前一个问题上，中国近 15 年大致一直面对困境，而近几年来尤甚。一贯坚持并努力谋求半岛稳定和和平的中国为何连连受挫？坦率地说，中国对朝鲜旨在争取稳定的和平和朝鲜无核化的影响力，被同属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成分所抵消，那就是中国愈益广泛、严厉的对朝制裁，而这反过来促使朝鲜愈益对华怀抱敌意。即使朝方主要为与韩美两国首脑谈判交易而急剧改善对华关系，中国几乎极广泛和极严厉的对朝制裁这一要害问题照样存在，因而必须予以缓解。中国对美的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有力证据就是特朗普政府在整个 2017 年大违中国所愿，不断且愈益激烈地发出对朝军事打击威胁，并且无休止地施加压力，要中国参与对朝经济施压，以致中国在接连提升对朝制裁后，已经接近穷尽对朝经济压力杠杆。至于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则在 2017 年 10 月底中韩达成协议之前也部分被抵消。

自金正恩 2018 年 1 月 1 日发出朝韩会谈以讨论朝鲜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倡议以来，朝鲜问题以平壤大致掌握主动权为首要特征，急剧和持续地发生重大变换。首先，朝韩关系和美朝关系大为缓解，特别是金正恩与文在寅实现最高级会晤，发表宣告结束半岛南北军事对抗状态的《板门店宣言》，而且朝美两国密集地商议并举行了史上首次两国元首会晤。由此，半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急速消减，以至于在可预见的未来接近于无。朝鲜非核化问题发生重大的良性变化亦成近期必然之势。其次，金正恩戏剧性地突然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卓有成效的最高级会谈。中朝关系由此骤然摆脱保持过久的历史最低点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一项急剧变化出自前一项，而前一项则首先出自下述事实：朝鲜已经拥有或非常接近拥有可实战的核中程导弹，从而具备了在任何可以设想的一般情况下至少最低限度的核威慑。这一点令平壤可以从事

真正的部分非核化（包括切实放弃远程核导弹以及切实保证不再研发核潜射导弹之类新型核武器），换取它从美国得到军事、外交和经济上“阶段性和同步的”重要让步。可以认为，朝鲜彻底非核化的可能性甚小，但朝鲜部分非核化和朝鲜对外政策相对和平化的前景颇可期待。在此形势下，中国有自己的头等要务：第一，坚持中国的应有权利和作用，扩大和深化对朝鲜问题局势剧变的实质性参与，防止和阻止中国的正当利益和关切遭到其他方面的忽视或损害；第二，维护和增进来之不易的中朝关系改善，为此首先需要适当地调整对朝经济政策，及时和妥善地重筑现已削弱的中朝关系经济基础。

至于可能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对抗，则不仅需要“治标”性质的综合对策，即坚决有力的贸易报复威胁与谈判妥协意愿相结合，也需要有“治本”性质的基本认识和战略决心，后者在一定意义上远更重要和深刻。必须认识到，全球既有秩序，至少是大致自由和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已经或正在失去在发达世界内的很大部分国内社会基础，甚或政治基础。这就表明，既有的全球化要扬长弃短、改造更新，从而获得真正的可持续性，就不仅需要像中国政府已经反复提倡的那样，在比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上变得比较公正，比较均衡，而且需要多少考虑发达国家愈益增强的抱怨甚而愤怒并作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全球化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和政治基础。这后一点，是中国多年来一直认识不足、举措过慢过微的，而现今我们正在就此面临急剧的冲击和考验，首先是几乎急剧到来的中美贸易对抗。粗略地说，这个世界的问题不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也是中国与其余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和发达国家内部的共同富裕问题。中国不做一定程度的适当调整，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就不大可能持续下去。

2018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意义重大的主旨演讲，其中宣告了中国政府在“治本”意义上决定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中国确实需要多少考虑发达国家愈益增强的愤怒而作

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既有的全球化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社会和政治基础。以此同时,这样的重大举措也大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高质量发展。就近期和中期来看,特朗普是个残忍的战略家和精明的战术家,阶段性地集中在一个他发动的战役上,然后经过时间不长的休战,又集中在同样是他发动的又一个战役上。他的战略战术是施加空前程度的压力和空前程度的威胁,间或又给对方“甜枣”吃,其目的都是为在一个接一个的战役中获得

尽可能大的利得。中国现在必须在对美经贸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更重要的是,这些让步贯彻得妥当,会大有利于中国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如此,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局势还告诉我们,中国需要通过真正大力度和持久的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争取实质性地大大开发中国潜能依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从而相应地减小中国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和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

警惕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沉渣泛起

赵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执行主编)

麦卡锡主义特指 1950 年到 1954 年间,美国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美国国内掀起一股极端反共、反民主的政治逆流。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近 2000 万美国人遭受迫害,麦卡锡主义因而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而麦卡锡主义时代则成为美国历史上极其黑暗的历史时期。

1950 年 2 月 9 日,时任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发表演说,称他握有一份美国国务院中的 205 名共产党员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的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这番演说令全美哗然,紧接着,麦卡锡在美国参议院掀起“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恶浪。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称杜鲁门政府中有人“私通苏联”。1951 年 6 月 14 日,麦卡锡发表长达 6 万字的长篇演说,将矛头直指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重要制定者乔治·马歇尔将军。他把马歇尔将军说成是“叛徒”,说他在国务院任职期间“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同时,受到麦卡锡无端指责的还有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外交官和中国问题专家,如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谢伟思等。1953 年 4 月,麦卡锡开始对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将左翼作家威廉·福斯特、白劳德、史

沫特莱等 75 位作家的书籍列为禁书,历史学家小阿瑟·史莱辛格和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近 200 万册书籍被下架。

在麦卡锡主义肆虐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大学等都未能逃脱“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近 2000 万名美国进步人士遭到恶意诽谤和迫害,其中最著名的有:美国共产党人罗森堡夫妇因被控为苏联做间谍被处以死刑;著名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主要领导人罗伯特·奥本海默被忠诚调查委员会认定有罪,被迫切断与核机密的联系;以对中国革命的报道而著称的左翼记者史沫特莱被污蔑为苏联间谍而被迫流亡;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被麦卡锡公开斥责为“美国的敌人”;曾在抗战期间访华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因报道中的左翼倾向而被解雇;喜剧演员卓别林被指责从事“非美行为”、倾向共产党而被迫离开美国;核物理学家钱学森被指控参加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传讯;曾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的左翼记者埃德加·斯诺遭受政治迫害,不得不偕夫人离开美国远走瑞士。

美苏冷战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出现并横行一时的重要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美国,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